

晚清人的域外游记

曹 虹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清代前中期游记撰著中,已开始出现域外游历与知见视野空前广泛的“海事”之书,但直到晚清,才迎来官方或私人海外游历活动的剧增,并促成域外游记的持续涌现。晚清人的域外游记作为知识谱系积累和主题格局拓展,表现出由浅趋深的过程。在众多的域外游记作者中,与桐城派文脉关联的作家,一时颇居担纲之任,如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对推动游记文学向近代新变的成就令人瞩目,值得强调。在晚清域外游记尾声中,亦显示此体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与审美力量。

关键词: 晚清; 域外游记; 郭嵩焘; 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0)04-0033-08

Overseas Travel Notes of People in Late Qing Dynasty

CAO H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Of the travel notes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s in the Qing Dynasty, books of “maritime affairs” has begun to appear with an unprecedented wide range of travel and knowledge, but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at the official or private overseas travel activitie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the overseas travel notes continued to emerge. As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genea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me pattern, overseas travel notes of people in late Qing Dynasty showed the process from shallow to deep. Among the writers of overseas travel notes, those who were related to the context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such as GUO Songtao, LI Shuchang and XUE Fucheng, etc.,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travel literature to modern new change, which was worth emphasizing. The overseas travel note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lso shows the mission and aesthetic power of the time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overseas travel notes; GUO Songtao; Tongcheng School

明清易代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一度较为活跃。康熙朝前期,亦曾出现过比较开放的局面。但随着天主教与清廷矛盾的激化,加之其他政治方面的原因,康熙帝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因此,清代前中期的域外游记数量有限^①,这种状况到了鸦片战争后才大有改观。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破了清政府统治者天朝盛世的美梦,“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p3]}。随着国门的逐渐开放,官方或私人的海外游历日益增加,这批人本着学习西方的共同目的,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域外游记,为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促成了游记体的审美拓展。

^① 这段时期的游记主要有释大汕《海外纪事》、樊守义《身见录》、图理琛《异域录》、谢清高《海录》、王大海《海岛逸志》、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程逊我《噶喇吧纪略》、蔡廷兰《海南杂著》等。

收稿日期: 2020-03-17

作者简介: 曹虹(1958-),女,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佛教、域外汉文学。

从清代初中期的游记撰著看,有两部谈“海事”之书,其作者的经历与视野之广远颇有开拓性。樊守义的《身见录》,是中国人以中文记述的第一部欧洲游记^①,同时也是第一篇中国人撰写的美洲游记^②。樊守义少时即入天主教,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随西洋传教士艾约瑟前往罗马,康熙五十八年(1719)回国。《身见录·自序》述其成书经过:“凡所过山川都邑,及夫艰险风波,难更仆数。其或耳闻之而目有未睹者,我姑弗道;即所亲历,亦竟未尝笔载一端。……至辛丑(1721)孟夏,蒙王公大人殷殷垂顾,询以大西洋人物风土。余始以十余年之浪迹,一一追思,恍如昨见。爰举往返颠末,为记其略云。”^[2](p40-41)]虽属事后追忆之作,记述亦颇简略,但其内容涉及颇广,举凡气候、物产、人种、城市、港口、建筑、宗教、文化、教育、风俗等,一一记述,具有开创意义。惜书成后并未刊行,原稿今藏罗马国立图书馆,附残抄本《名理探》后,国人见者极鲜。由于《身见录》埋没不彰,过去人们多以为“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3](p549)]。谢清高“遍历海中诸国”的时间大约在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元年(1782-1796)之间,其《海录》分95则,记录了谢清高所经历95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对贸易、工艺、生活、风俗、礼仪制度记载较多,最有价值的是其对太平洋岛屿和白令海峡地区自然与人文地理情况的记载,不仅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上也是较早的。此书署“杨炳南撰”,系谢氏口述,杨炳南笔录^③,地理学家李兆洛和吴兰修亦曾参与整理^④。此书在晚清人的海外知识视野建构中颇有因缘,书成后曾多次刊印,被多家丛书收录^⑤。林则徐称其“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并加以引用。魏源编《海国图志》、徐继畲撰《瀛环志略》,亦曾参考此书。晚清旅者们因背负着国耻的自卑与忧伤,与樊、谢等盛世旅人的书写心态与渴求自是不同同日而语。晚清域外游记,从其反映的内容可作阶段性的认识,并可在审美成就上体悟其近代化的特征。

一、序曲新奏

近代以来,延续清初海外经商与私人出游的形式,个人域外旅行依旧持续并越发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国事与时局的变化,清廷也感觉“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4](卷五一, p286下)]。遂开始着手派使臣出访,并相继派出了三次临时性的使节出洋^⑥。作为近代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群体,他们留下的游记如下:林鍼《西海纪游草》、容闳《西学东渐记》^⑦、罗森《日本日记》、郭连城《西游笔略》、斌椿《乘槎笔记》、张德彝“八述奇”、王韬《漫游随录》、志刚《初使泰西记》、孙家谷《使西书略》、祁兆熙《游美洲日记》。这些游记所描述的大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代表了初出国门的国人对西方的肤浅认识。他们出国目的不同、身

① 古代域外游记游踪大抵止于朝鲜、日本、南洋、阿拉伯诸国,到过欧洲并有著述流传的为元代巴班马,但其记述为古叙利亚文,至今无汉译问世。

② 文中记有“亚墨里加洲巴以亚府”,即葡萄牙人1549年建立的Bahia城,为巴西总督辖区首府。

③ 其书序云“向来志外国者,得之传闻,证于谢君所见,或合或不合。盖海外荒远,无可征验,而复佐以文人藻绩,宜其华而鲜实矣。谢君言甚朴拙,属余录之,以为平生阅历得藉以传,死且不朽。余感其意,逐条记之,名曰《海录》。”见《海录序》,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29页。

④ 蒋彤编《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谱》卷二“道光元年”条载“有吴石华兰修,官广文,有学问。其言乡人谢清高者,幼而随洋商船周历海国,无所不到,到必留意搜访,目验口稽,出入十余年。今以两目表明,恨不得一人纪其所见,传之于后。因受其所言,为《海录》一卷。先生取阅之,所言具有条理,于洪涛巨浸茫忽数万里中,指数如视堂奥;又于红毛荷兰诸国吞并滨海小邦,要隘处辄留兵戍守,皆一一能详,尤深得要领者。然嫌其草草授简,未尽精审,或失检会,前后差殊。因属石华招之来,将补缀而覆正焉。又以清高所言与故籍所载或合或不合,或影响相似。古来著书者大抵得之于传闻,未必如清高之身历。而清高又不知书,不能辨证古今之同异,因又检诸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9-80页)

⑤ 1842年王蕴香辑印《域外丛书》、1843年郑光祖辑印《舟车所至》、潘仕成所辑《海山仙馆丛书》都有收入。

⑥ 三次分别如下:同治五年,总理衙门遂派斌椿率同文馆一行五人以观光的名义赴欧洲游历,此行的任务是“飭将所过之山水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同治七年,清政府决定派遣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出使,到各条约国修约;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总理衙门遣使不再依赖洋人,派出了专使崇厚代表中国政府出使法国,赔礼道歉。

⑦ 容闳是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西学东渐记》系其1909年以英文写成的回忆录,书中记载了他自1847年至1854年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份不一:有的是官方派遣的官员,如斌椿、张德彝、志刚、孙家谷、祁兆熙等;有的是商人,如林鍼、罗森等;有的属于逃亡的知识分子,如王韬;有的属于教徒,如郭连成;还有留学生,如容闳。本时期的游记作品侧重于介绍在各国的经历和见闻,器物层面的介绍显得较为突出,如火车、铁路、电梯、自行车等,表现出对西方的“奇技淫巧”强烈的猎奇心理,在主题的拓展上带来新变。古代的游记重在行旅途中对自然景观的观感与哲思,比及晚清,由于出游目的改变,旅行者接触到异国都会,关注其民情风俗、政治制度等各种社会现象,导致游记内容倾向于描写社会景观。新世界陌生而奇异的物质文明与社会设施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异国自然风景的新鲜感,所以游记中的自然山水开始由主角退居配角,出现了以“社会相”为主、“自然相”为辅的游记主题格局。

王韬是这一时期异域游记创作中的佼佼者。王氏早年即有才名,科场失意后在上海受雇于英人麦都思的墨海书馆,得以接触西学。后被迫逃亡欧洲^①,又曾赴日考察,留下了《漫游随录》51篇和《扶桑游记》3卷,堪称姊妹篇。《漫游随录》自序称,“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前路之导,捷足之登”^{[5][p2]},“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5][p82]}。他发现西人注重实学,而中国人“尚诗赋辞章”,认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进步,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方。这两部游记除了介绍旅途见闻、风土人情、异国风光、先进科技之外,还述及西方的政治教育等现代制度。其中《漫游随录》对于自然科学成就、政治法律制度、文学艺术记述颇详,《扶桑游记》侧重描述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变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其游记写法不囿于陈规旧律,采取开放的态度,间或穿插诗歌。伴随游记内容的扩展及功能的转变,晚清异域游记的体貌悄然发生着改变,这在像王韬这样文学观较为开朗的作者笔下^②,尤其如此。

二、桐城派担纲

“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6](卷二百一十二,48781)}迫于时局的压力,清政府不得不派使出国处理邦交事务。构成这一时期域外游历主体的人士大多官高位显、学养深厚。他们相继出使或出国考察,或是遵循总理衙门的规定^③,或是记录自己的所感所想,写下了数量众多的域外游记。相较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突破了单纯猎奇的眼光,深入到政体礼俗的层面,观察态度也不无交锋或互援,产生了能代表晚清域外游记标杆成就的作品。

在众多的域外游记作品中,与桐城派文脉产生关联的作家、作品又是最为突出的。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人不仅精通洋务、外交表现出色,其域外游记作品也能带来更多的思想力量和审美探索,推动传统游记文学和桐城文脉向近代化发展,不愧为奉使泰西的“美使才”^④。

郭嵩焘是清廷派往西方的首任出使大臣,驻英两年,留下了《伦敦与巴黎日记》。郭氏的出使是洋务派与保守派斗争的结果,一开始就种下了悲剧的基因^⑤,在与副使刘锡鸿的较量中度过了驻使生活。当郭氏遵循朝廷的规定,把赴英途中50多天的日记加以整理编成《使西纪程》,上呈给总理衙门时,却遭到了毁版的命运^⑥。在郭氏的游记中,可以看到一个在中西文化对比刺激下的思索者形象。《使西纪

① 按:王韬因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逃亡香港,后至英国。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认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③ 清政府对于出使人员规定“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见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咨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页。

④ 《清史稿》曰“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崇厚擅定俄约,误国甚矣。纪泽继之,抗议改正。其时国势犹足自申焉。至儒争密约,竟以愤死,终不能挽救,公理尚可恃乎?福成、庶昌诸人,并娴文学,各有著述,讨论修饰,皆美使才也。”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90页。

⑤ 按:清政府派一副使刘锡鸿牵制郭嵩焘,在郭氏出使时,士大夫中甚至流传一副对联来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初三》,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460页。

⑥ 按:郭氏遭弹劾的原因是“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证据就是郭氏在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候盛候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陵,智力兼胜。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

程》在义理层面凸显西洋新知与洋务理念,标志着传统古文随“西学”输入而发生了深刻的新变。^[7]郭嵩焘借游记发政论,这一特点被以后的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在晚清域外游记中,议论功能的放大,其实正是作者拯物济世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感的自然发露,他们在惊奇于异国文明时,常常要反思本国历史与现实,一番议论便发之于心、诉诸笔端。郭嵩焘熟悉封建政治,谙熟洋务^①,在西方社会与国内现实的反观对照中,逐步认识到西洋文明的优越。在郭氏之前或同时的出洋人士中,已出现对中西文化差异加以沟通解释者,但应对模式都不出“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8] [p177]}之类的“西学中源”说和稍稍并置接纳西学进步性的“中体西用”说^②。郭嵩焘超出众流的可贵在于,他更注目于文化本质上的新创。夏敬观《清世说新语·政事》记载“郭嵩焘出使泰西,问政采风,嗟咤叹美,归而语人曰‘孔孟欺我也。’”校注者刘强先生认为此“乃兴到之语,非真自绝孔孟之道也”^{[9] [p56]}。但不可忽略的是,郭氏实不愿受中西兼顾框架的束缚,这在积极对待西洋政体民俗的进步性方面,无疑最能突破旧传统学人的暧昧感。郭嵩焘在游记中称颂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批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他说“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10] [p626-627]}通过对西方的民政、舆论、司法、经济、军事、教育等设施的实地考察,他认为“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10] [p156]}。因其议论无顾忌,最终获咎于朝廷,落得郁郁而终的结局。

黎庶昌曾游历东西洋,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随使欧洲,历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后又两度出任驻日本大臣。其《西洋杂志》汇集了他旅欧期间所写的杂记、游记、书简和地志等。因重视民俗对生活环境和心理特质的反映功能,《西洋杂志》对此颇有侧重,堪比19世纪西洋生活的一卷风俗图^{[11] [p306]}。他用桐城派的古文笔法来摹状异国的社会风情,观察入微,描写细致。有的记述了欧洲王室和官员们的生活情形,如《伯理玺天德宴客》《日国公使慰奠君后》《日君主宴客》《日君主行养老之礼》《英君主游历》;有的记载婚丧嫁娶生育风俗,如《预贺生子》《生子女取证》《生子女命名》《婚姻立约》《英外部告公主之丧》《英国为邻邦制服》《美亚嫁女》;还有的描写公众娱乐和节庆活动,如《巴黎灯会》《轻气球》《敷伦赛船之戏》《赛马之戏》《斗牛之戏》《溜冰之戏》《马戏》《吕宋赌票局》《加尔得陇大会》《耶稣复生日》等;他还将欧洲国家的货币写成专题,显示对经济事项的关注。文中摄入了若干外来词,如伯理玺天德(总统)、美亚(市长),与汉语词汇相错而出,新人耳目。以黎氏与桐城文脉的关系之深,却也能在语汇上沾染时风,可谓不失通达。

黎庶昌任日本公使六年,通过文化外交,与许多日本文士交上了朋友,“上巳、重阳,每岁必举特别之会,使与兰亭、龙山相配”(《宴集三编序》)。就这样几年间,共有诗文数百首,由随员孙点整理刊印,编成四本集子,即《癸未重九宴集编》《戊子重九宴集编》《庚寅宴集三编》(包括《修禊集》《登高集》《题襟集》)和《枕流馆集》。吴汝纶在获读他的《拙尊园丛稿》后,给他的信中这样评价:“今得全集,则佳篇至多,其气势博大,动中自然,在曾门中,已能自树一帜,非廉卿所能掩蔽。某尤服余编内外(按:指黎氏出国期间所写的关于东西洋的文章),以为尊著极盛之诣,非他家所有。曾、张(按:指曾国藩、张裕钊)深于文事而耳目不逮;郭、薛长于议论,经涉殊域矣,而颇杂公牍、笔记体裁,无笃雅可诵之作。余子纷纷,愈不足数。”^{[12] [p100]}这里表彰黎庶昌对曾门古文的贡献:曾国藩与张裕钊的“深于文事”已是对桐城一脉的延承与发展,黎庶昌凭着才学与阅历及陶染于乡人郑珍文风,其文章“闳肆华赡而又清新淡雅,开阖自如”,^{[13] [p120]}所以在曾门中有“自树一帜”,不为同道所掩之名。黎氏有些单独成文的名篇,如《奉使伦敦记》《巴黎赛会纪略》《卜来敦记》《巴黎油画院》《游日光山记》《游盐原记》《访徐福墓记》等,或描述海上奇景,或记载巴黎、伦敦见闻,或描摹日本自然风光,写景状物,辞采华赡,又富有异国情调,给人以奇警妙曼之感。黎氏气质更接近文人,其描写异邦景物的文字也稍多于其他作者。他描绘外国图景擅长使用传统文学的语言或典故,显出传统文人的审美底蕴,从中也可理解何以他的游记更富于文

① 李鸿章称赞“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见李鸿章《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上曾相》,《朋僚函稿》卷一,《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26页。

② 参陈室如《近代域外游记研究(1840-1945)》,北京:天津出版社,2008年,第134-140页。

学性。

薛福成把“驰观于域外”的经历变成写作宝藏,“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小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以为日记”。^{[14] (p288)} 他为曾、李拟办过许多文稿,光绪元年(1875),上《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光绪五年(1879),写《筹洋刍议》,得到朝廷要员的赏识^①。薛氏于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1890-1894)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行三万五千程,历三十有四日,始至法国,继驻英京”。^{[14] (p288)} 写下《出使英法比日记》六卷、《出使日记续刻》十卷。薛氏在自序中说其日记“大较由考核而得于昔者,十有五六;由见闻而得于今者,十有三四也”。^{[14] (p9)} 这当然是说明其日记取材的直接与间接来源,但这里把“考核”作为写作的一项义例,不得不令人联想到桐城派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义,特别是“以考证助文章之境”的写作理念。薛福成在海外游历日记的题材体裁处理中,对姚鼐文章学思想不无呼应,也是新形势下对“考核”入文章的一种新实践,且带来了一定的“学人”之文的特色。薛福成在日记凡例中提出“述事之外,务恢新义,兼网旧闻”。^{[14] (p10)} 如果说“兼网旧闻”是体现其“考核”之功,那么“务恢新义”就是桐城派注重“义理”的新发展,是把“文以载道”的热情运用于新的时代课题的探究与开拓。

有趣的是,薛福成的“新义”求取,与郭嵩焘、黎庶昌等人的敦励有关。他在日记中有所交代: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美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郭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14] (p83-84)}

郭嵩焘触及中西政教优劣之议,被固守传统文化的守正清议之士所不容。薛氏颇参与时务历练,心胸非一味守正者比,对郭氏之议只是猜其程度当否,应无推翻之想是肯定的。在这样的情势下,他询及黎庶昌、陈兰彬(字荔秋,曾在咸丰十年入曾国藩幕府)这些使臣,得到了“其说不诬”的心理支持,并且通过自己亲身游历考察印证,确信郭嵩焘思想的深刻性。在这里,略可感到在郭嵩焘、黎庶昌、陈兰彬、薛福成之间,似有某种学脉文派趣味的潜在勾连或支撑,使他们容易取得彼此信任。

凭着对“务恢新义”的自觉,薛福成敏锐地“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就是对西方政治、教育、司法、民生等制度考察,探求西方富强之本原。薛福成的日记文笔与郭嵩焘有相似之处,就是喜发议论,他在游记中宣称“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15] (p538)} 与郭嵩焘“君民兼主国政”说桴鼓相应。他的文章并不宣传僵化的封建“义理”,而是传播力主变革的进步思想,因而充满了生命力。薛福成的游记中还有一些写景状物的名篇,如《观巴黎油画记》《过阿尔卑斯山》《白雷登海口避暑记》等,称得上是“别开生面”的作品。^{[16] (p602)} 其中《观巴黎油画记》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普法战争中法军惨败的画面“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视天,则明月斜挂,云霞掩映;俯视地,则绿草如茵,川原无际。情景靡不逼真,几自疑身外即战场,而忘其在一室中者。”他领悟到法人作画的目的是“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14] (p58)} 其中“昭炯戒”与中国传统的诗教观最易相通,但“激众愤”的情感渲染效果则是他直接面对法国美术作品所作归纳,更具西洋审美观感。

在光绪朝前期约二十年间,还有一些旅人以官方或私人的身份出游而留下多种游记^②,共同构成此期域外游记的繁荣局面。不过,正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唐文治执笔完成《英轺日记》所撰定的“凡例”称“出洋日记近人所著,首推郭嵩焘之《使西纪程》、薛福成之《四国日记》”。^{[17] (p7)} 可知郭、薛二人的出洋日记已雄居“首推”地位,其标杆意义已显豁于学界。当然,作为后续者的唐文治仍有“青出于蓝”之

① 丁宝桢上疏保他“学堪致用,识略闳深”、“识微鉴远,洞中机宜;其体国之忱,匡时之略,应机之敏,料敌之明,超越寻常万万”。李鸿章称赞他是“不可多得之才”。郭嵩焘说他“博学多通,如西洋地势、制度,条举缕分,精习无遗,而性情纯朴笃实,一无虚饰”。光绪四年(1878),新任驻德公使刘锡鸿亦希望薛福成做他的参赞。

② 前者如担任郭嵩焘副使的刘锡鸿著有《英轺日记》(一名《英轺私记》),对西方文明有所认识,又通过贬低他者文化来维护本位文化;徐建寅的《欧游杂录》记载赴德英法考察海军、兵工,订购军舰,为清季出使游记中有关工业技术交流的专著;钱德培《欧游随笔》、李凤苞《使德日记》、陈兰彬《使美纪略》、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等也有代表性。光绪十三年(1887),清廷通过考试选拔,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四大洲20余国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游历使撰写了几十种外国调查研究报告和海外游记。私人身份的游记主要有:李圭代表中国工商界参加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而留下的《环游世界新录》,潘飞声的《西海纪行》《天外归棹录》等。

念,在体例上更思改进,这也是不奇怪的。

三、考察入深

甲午战后,一些有识之士已逐渐认识到,光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域外考察的眼光主要放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以至于清末的域外游记呈现出明显的实证考察性质。康梁逃亡、东游旅人赴日取经、出使大臣出洋考察、单士厘的出洋书写,共同组成了晚清域外游记的尾声。

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长期流亡海外,不但增广了见闻,而且在与西方世界的实际接触中,他们的思想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都体现在他们的游记作品中。康有为遍览四洲,经31国,行60万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所到国家最多、接触世界各国人物最多的旅人^{[18] [p72]},留下《意大利游记》《法兰西游记》等列国游记26篇。梁启超亦曾前往美国、澳洲、新加坡等地宣传保皇思想,他的《夏威夷游记》(又名《汗漫录》、《半九十录》)、《澳洲游记》及《新大陆游记》代表其旅行的结晶。在康、梁的游记中,可以看到他们思想转变乃至激变的轨迹,钱穆认为“南海思想之激变,实亦欧游有以启之也。”^{[19] [p329]}洪铭水指出“梁启超的游记,不但提供‘文化人记游’的一种范本,而且提供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思想转变的重要文件。”^{[20] [p95]}康有为游记借题发挥,运用其历史、地理知识,纵论外国尤其是中国的政俗,既持续宣传中国必须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在各方面施行变法,又宣传革命不如立宪的观点,推动其保皇主张。欧游的见闻也为康氏后来走向保守埋下了伏笔。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立场发生了由“革命排满”向拥护君主立宪的转变,其书还对资本主义理论及制度的优越性做了介绍。梁氏重视游记传播知识、思想的功能,刻意维持了写作原则,他说“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惟历史有有关系之地特详焉。”^{[21] [p10]}他还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主张,对于文体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此阶段异域游记的显著特征是考察记的大量出现。迫于甲午战败后的痛定思痛,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颁谕实行新政,要求各省督抚提出时局对策^①。此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派员出国考察,由日本进而西方成为首选的考察路线。因为赴日不仅路近费省,且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以至于赴日考察出现高峰,官员考察者人数众多,留学生人数也大量增加^②。光绪三十一年(1904),袁世凯制定《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规定游历后必须呈验日记。考察的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商业、农务等多个方面,其中政法、军事、教育考察成果丰富。政法方面,有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刘瑞璘《东游考政录》、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刘杼《铃洲游记》、^[22]金绍城《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等;教育方面,有沈翊清《东游日记》、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罗振玉《扶桑两月记》、吴汝纶《东游丛录》等,《东游丛录》更是晚清教育考察记中影响最大者;^[23]军事方面,有丁鸿臣《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和《游历日本视察兵制学制日记》、钱德培《重游东瀛阅操记》等。^[24]

在以男性为旅人主体的情形下,单士厘的出现无异于一朵奇葩。她随担任外交官的丈夫钱恂西行,留下《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等作品。《癸卯旅行记》主要记载其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80天的行程,《归潜记》主要记述意大利和古希腊罗马艺文,以及对中西文化史的关注。正如钱恂为《癸卯旅行记》所撰题记称“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25] [p683]}由于独特的性别视角,单士厘在游记中关注妇女的生存状况,通过中外比较,她注意到中国女德传统不失为一种潜在资源,但女教复振的近代理想宜借鉴诸如“日本女学校教法”,“而女德云者,初非一物不见,一事不知之谓”,强化开发智识的功能,“苟善于教育,开诱其智,以完全其德,当为地球无二之女教国”^{[25] [p697-698]}。出于较为明达的比较文化心态,单士厘不仅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进步,也能看到帝国主

① 清政府发布上谕“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602页。

② 据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视察》(东京成文堂1998年版)统计,从甲午战争到民国成立之前,由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派遣赴日视察的官员人数分别为424人与958人。至于留学生,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统计,1896年清廷首次派遣赴日的学生仅有13人,1903年增至1000名,1905、1906年留日学生更是高达8000人。

义的掠夺本质,并怀着爱国挚诚加以挞伐。此外,得益于个人才学与家庭氛围,其游记还表现了作者弘雅的审美能力,诸多介绍希腊神话、罗马建筑等的文字,是传统的都城纪胜散文的近代新篇。

四、审美特征总览

中国传统的游记概念自古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游记专指文学游记。由于晚清域外游记的复杂性,已难归单纯的文学游记,属于广义的游记,包括一切因“游”而“记”的作品,如行役记、科学考察记、政治考察记、宗教考察记、军事考察记、教育考察记、风俗记、山水名胜记等。伴随着游记内容的扩展及功能的转变,晚清域外游记的体貌也悄然发生着改变,在如下三个方面大致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游记主题的拓展。中国古代的游记,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以构建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的。旅行中自然景观的观感与哲思,成为历代游记的主宰书写主题。比及晚清,由于出游目的的改变,旅行者接触到的是异国的都会,关注的是政情风俗等各种社会现象,导致游记内容普遍倾向于描写社会景观。新世界陌生的物质文明与社会现象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异国自然风景的新鲜感,所以晚清域外游记中,自然山水开始由主角退居配角,出现了以“社会相”为主、“自然相”为辅的游记主题格局。晚清域外游记正是承载着一种社会责任感,描述了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从而使传统的自然风光成为游记的点缀。在游记中,读者可以感知诸如火车、轮船、显微镜、枪炮等声光光电方面的“格致之学”;还可以窥觉西方政治生活之一斑,如资产阶级的议院、国会、监狱、报纸等;也能够了解西洋风俗,诸如各种节日、斗牛之戏、西方礼俗等等,可以说,晚清人的游记作品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西洋生活的百科全书。

二是艺术手法的创新。随着游记记述主题的改变,晚清域外游记从书写形式上和表现手法上,都产生了新的突破。

晚清域外游记改变了传统游记以散文为主的单一格局,采取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促进了游记书写形式的解放。首先,在文体上晚清域外游记综合运用了骈文、辞赋、五七言绝句、律诗、古乐府、组诗等文体式样。如林鍼的《西海纪游草》,该书分为三部分,就运用了三种不同的文体,《西海纪游自序》运用骈文,《西海纪游诗》为五言诗,《救回被诱潮人记》属纪事散文,用三种文体描述在美国的见闻和经历感想。斌椿的《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则纯用诗体记游,王韬的《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中间也或穿插诗歌。其次,以散文为主要书写文体时,具体的书写形式也是不同的,有日记体、杂记体和书信体多种形式。《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伦敦与巴黎日记》等属于日记体,而《西洋杂志》则属于杂记体,《西洋杂志》中就收有五篇书信体的游记。此外,在晚清域外游记中,还添加了许多新元素,那就是现代各种应用公牍文的使用,晚清旅人大多具有一定的保存意识^①,举凡现代外交必备的公文,如国书、颂辞、照会、奏疏、上谕、新闻、邸钞、电文等,无一不录。然而,正是这种兼容意识,使他们的游记出现了一种混生的新貌。

在游记的表现手法上,晚清域外游记打破了古代游记散文以写景、抒情为主的格局,为了适应表达内容的需要,主要采用了说明和议论的手法,辅之以记叙描写,抒情较少。说明的使用,使晚清域外游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性游记。议论也备受游记作者青睐,在晚清域外游记中,议论的功能已被放大,他们在惊奇于异国文明时,常常要反观本国,一番议论便发之于心、诉之于笔。郭嵩焘和薛福成是最喜议论的,他们出于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感,常常在游记中发表议论,或赞美西方的公序良俗,或反思本国现状。总之,描写、抒情让位于以说明、议论为主的表现手法,使近代域外游记呈现出与传统游记不一样的美学风格。

三是丰富的语言。晚清域外游记除了继承传统游记的语言之外,还注入了新的词汇、语法,也更趋于通俗化。他们游记的语言以浅近文言为主,其中已明显出现了向白话转变的趋势。汉语词汇与外国

^① 薛福成说“凡事有一定格式,得其格式,事乃易办。中国遣使,本系创举,求之古书,并无成式可循。兹编于国书颂辞,无不详载,以存体制。至与外部往返洋文照会书信,间亦译登一二,用示格式,并可征中西文法之稍有不同。”见《出使四国日记·凡例》,第10页。

新词汇相错而出,既熟悉又陌生,新颖奇特,新人耳目,或用旧语言写新景物,或用新语言写旧意境,别具韵味。游记中出现了大量的外来词,诸如伯理玺天德(总统)、恩伯洛尔(皇帝)、买阿尔(市长)、美亚(市长)、安那多米法尔妙西因(解剖陈列馆)、和尔(市政厅)、巴力门(议会)、火轮车、火轮船、传真之器、圣诞、自行屋(指电梯)、照相、显微镜、啤酒、伴郎、邮政、电气灯、煤气灯、信票(邮票)、赛美会、自行车等等,这些对新事物的称呼,有些是自造的,今天看来不免生硬,如传真之器、信票、赛美会等,但在词语未定型前的功劳却是不可忽视的;有些词是根据音译而来的,如伯理玺天德、恩伯洛尔、巴力门、安那多米法尔妙西因等;有些词则已经定型,今天仍然使用,如照相、自行车、显微镜、邮政、圣诞、伴郎等,外来词汇使得中国语言的词汇大大地丰富了。甚至还有英文直接写在日记中,虽然很少,但革新意义重大。毫不夸张地说,在汉语史上还没有哪一次像这样产生如此众多的新词汇。新名词的出现也直接促进了现代语言的变革,许多新的语法现象已有意无意地出现在游记中。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在晚清欧美游记中看到了中国语言的新变化,受到启发,结合西方诸国的语法理论,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书《马氏文通》。

域外游记的发展史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化而逐步推进的。以晚清走出国门的知识人为代表撰写的域外游记,其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中蕴含的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变革;其审美开拓,对晚清“新文体”的发展及游记的现代转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德〕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吕调阳.重刻《海录》序[A].嘉应州志(卷二九)[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 [4]宝 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王 韬.漫游随录图记[M].王稼句点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 [6]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吴 微.西学的输入与晚清古文的新变:郭嵩焘外交日记《使西纪程》的文化解读[J].重庆大学学报,2010(2):89-96.
- [8]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M].王杰成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5.
- [9]夏敬观.清世说新语校注[M].刘 强校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10]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
- [11]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12]吴汝纶.答黎莼斋[A].吴汝纶全集(第三册)[M].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
- [13]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 [14]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M].宝 海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5]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16]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7]载 振.唐文治.英轺日记两种[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 [18]马洪林.康有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9]钱 穆.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A].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M].香港: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
- [20]洪铭水.梁启超与林献堂的美国游记[A].台湾文学散论——传统与现代[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9.
- [2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22]刘雨珍、孙雪梅.日本政法考察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3]吕顺长.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24]王宝平.日本军事考察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25]单士厘.癸卯旅行记[M].走向世界丛书[Z].长沙:岳麓书社,1985.

(责任编辑:刘伏玲)